



他們為什麼「旁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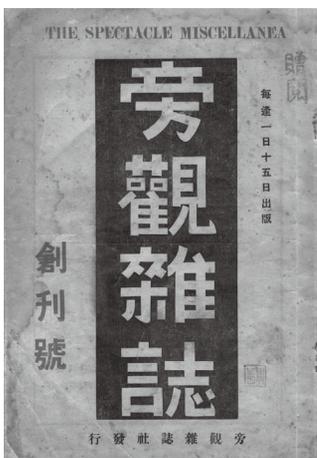
談《旁觀雜誌》的時代意義

許雪姬 ◎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研究員兼所長

壹、前言

有關戰後發行之重要雜誌一直是學界研究的主要課題，如賴永忠，〈臺灣地區雜誌發展之研究〉（注1）；何義麟，〈戰後初期臺灣出版事業發展之傳承與移植（1945 - 50）——雜誌目錄初編後之考察〉（注2），也有針對某一雜誌，或黨外雜誌做評論的，如林惠萱，〈臺灣黨外雜誌之研究——以「蓬萊島」系列為例〉（注3），郭紀舟，〈一九七〇年代臺灣左翼啓蒙運動——「夏潮」雜誌研究〉（注4），這其中最受青睞，且學界認為對往後臺灣民主化貢獻最大的《自由中國》雜誌之研究者不乏其人（注5）。她創刊於1949年11月，由國民黨內開明派和黨外自由主義者，不斷宣揚反對黨的理念，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政。除了《自由中國》外，對往後臺灣歷史風土研究最重要的雜誌《台灣風物》也在1951年12月出刊了；而在這兩個最重要雜誌之間卻有一份壽命不長、早已被遺忘的雜誌《旁觀雜誌》出現。這份雜誌在1951年1月15日創刊，他到底透露出什麼樣的時代氛圍？可先由雜誌的內容談起。

貳、「發刊詞」透露出不尋常的訊息



· 《旁觀雜誌》創刊號封面，可看見英文刊名及出刊頻率。

臺灣社會自1945年8月日本投降後，經歷中華民國的接收，1947年2月28日二二八事件的爆發，1949年5月20日戒嚴令的頒佈，1949年12月中央政府撤退來臺，臺灣知識分子由興奮而失望，由失望到懼怕，爲了明哲保身，對「國家民族」的態度趨於消極，該刊第一期〈寄臺灣智識界一代發刊詞〉分析智識界沈默的原因有三：

第一，本省智識份子大多抱負頗高，自尊心極強，在日治時代，過慣於憑經驗學歷取得職位的生活，對近年若干專講關係之人事演緣至感失望，而政府各級負責人又未能遍訪遺才，使智識份子有懷才不遇之憾，自然不肯輕易作「毛遂自薦」，因此，智識份子對政治顯得緘默，實在不用多怪。

第二，本省中年以下的智識界，在日治時代，因生長於日本最強盛之殖民階段，在以臺灣之安定來補強日本帝國之政策下，其特務警力已足以控制臺灣每一個人，所以一切均顯得有秩序，行法治，智識份子只要在日本帝國認為沒有危險性人物，便能安居樂業。可是近年來本省智識份子和政府負責人接觸得太少，而又遭到匪諜在省境陰謀不軌，使政府不得不厲行肅奸防諜，在拘捕嫌疑人犯時偶而牽及極少數無辜人物，遂不期然而然的使有政治見解的智識份子引起恐怖心理，生怕自己有被誤解可能，所以認為「明哲保身」，無事即福，對一切政治，均不願自發的參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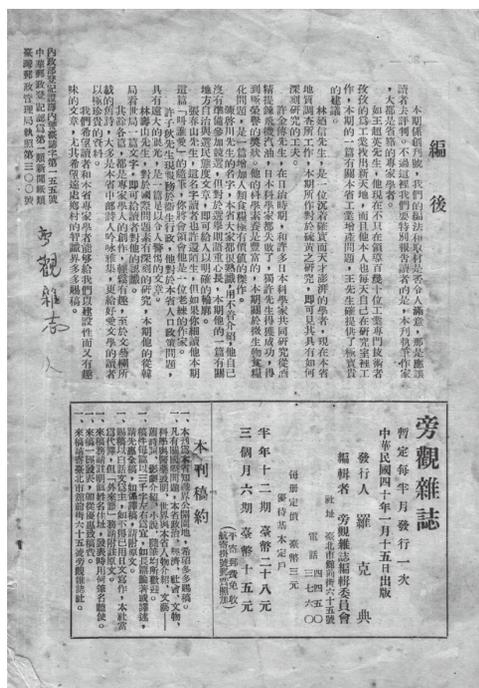
第三，自從政府由大陸移臺以後，不少人在心理上擔憂大陸匪軍之來犯。在韓戰以前，因美政府對我態度缺欠明朗，國際環境又頗於我不利，因此一般智識份子，顧慮一旦本省安全有問題或臺灣地位有問題，如果參加了政治，到時本身恐會被歧視。基於這一觀點，智識份子遂大多觀望不前，不敢積極參加政治工作。

爲了鼓勵臺籍人士以主人翁的姿態挑起國家的擔子，且爲了發行以「本省籍公務員、自治人員、民意代表、商家、實業家、合作界、鄉村領導層、學校教師與中學以上學生之需要爲對象」的雜誌，故創刊《旁觀雜誌》，用「旁觀者清的態度作對國家民族有益的建議」。最令人感到興趣的是，連執筆者也儘量約請省籍專家學者。這一本由本省人來寫，給本省人看的雜誌，與大多數服務外省人（內地讀者）爲取向的雜誌大異其趣。《旁觀雜誌》到底需要什麼樣的文章呢？據〈本刊稿約〉所載：「凡有關國際問題，本省政治、經濟、社會、文物、科學與醫藥發明，世界與本省人物介紹、文藝——舊詩詞、影劇介紹、小說、隨筆均所歡迎。」

但爲了顧慮臺人不熟習中文，因此稿約中特別聲明「賜稿以白話文爲主，如不得已用日文寫作，本社當爲代譯，但『外來語』務請附註原文」。由此稿約可知，此雜誌雖旨在勸臺灣知識份子發聲並積極支持政府，但卻不能不用綜合雜誌的外貌予以包裝，且不時寫些站在臺灣人立場的體己話，以博臺灣人知識分子的好感，從而產生向心力。但是這果然是臺灣人辦給臺灣人看的雜誌嗎？在戒嚴時期如果沒有靠山，誰敢辦這樣的雜誌？以下看看發行人是誰，謎底就解開了。

參、發行人羅克典

羅克典（1907 - 1992）（注6）廣東豐順人，私立上海持志大學商學科畢業，1925年加入中國國民



·《旁觀雜誌》封底，載有版權頁、稿約、編後等訊息。



黨，得胡漢民器重，先入國民政府行政院政務處任書記官，後受胡栽培，於 1935 年赴日，一面入東京帝大進修農業（注7），一面聯絡日本朝野反侵略人士，因七七事變發生，雖學業未成，仍遄返中國共赴國難。之後任廣東省民政廳視察，1938 年任故鄉豐順縣縣長，才 5 個月因省長吳鐵城去職，不久亦卸任，乃赴香港追隨已在香港、澳門主持國民黨黨務的吳鐵城，而後赴重慶，任職中央政治學校。後擬赴港從事僑務工作，卻因日軍攻佔香港，遂逃回重慶，任中宣部執行秘書，協助部長張道藩從事對敵心戰工作，前後五年。戰後奉命飛滬主持「對日文化工作委員會」，而後辭職經營澱粉製造業，以臺灣低廉的樹薯為原料。

1947 年 5 月魏道明就任臺灣省主席，羅因朋友之介來臺，由於能日語，又能說潮州話，被魏主席命為臺灣物資調節委員會主委兼主任秘書。1949 年繼李萬居之後擔任《台灣新生報》總經理，之後轉任中國國民黨臺灣省黨部委員，而後創辦《旁觀雜誌》，一年二個月即停刊。也因早與唐榮鐵工廠的總經理唐傳宗相識，因而被聘為該廠顧問直到唐榮廠被中華開發公司經營。之後與潮州同鄉林國長合辦農場，1951 年 11 月，國民大會代表豐順縣籍代表吳逸志過世，依「法」由他遞補（注8），一直到過世。

在羅的一生中以辦《旁觀雜誌》這一件事較值得一提。何以他要辦這個雜誌？他來到臺灣前，已向臺灣買樹薯做為製作澱粉的原料；來臺灣後他通臺語（與潮州話相近），又有東京帝大的學歷，能操日語，又非二二八事件之前即在臺灣的外省人，因此較受臺灣人的信任；而且在擔任臺灣省物資調節委員會（注9）時，常和同業公會的理事長和貿易公司的本省籍人士廣泛接觸，了解當時臺灣企業界的心聲，後掌《台灣新生報》，和臺灣的文化人又有更進一步的接觸。他觀察到臺灣文化人孤芳自賞，不願為五斗米折腰，既想要政府接受意見，但正式溝通時又語帶含蓄；加上 1949 年底中央政府遷臺後，勢非臺灣人「合作」不能立「國」，羅認為政府既要在臺灣生根，就必須消除政府與臺人間的隔膜，據他和林茂生（醫生）、陳瑞三、林江海、周百鍊、胡水旺、張深切等人商談的結果，認為要打破文化人的沈默最好是辦一雜誌，由文化人撰稿，但文化人怕事，沒人願意當發行人，羅克典乃當仁不讓，辦一個由臺灣人寫給臺灣人看的雜誌（注10）。在受邀約的文人筆下，讓閱讀者受其潛移默化，逐漸了解中央政府，換言之，以臺人出資、臺人撰稿、臺人閱讀為原則，來辦一個既能宣洩怨氣，也能提出建議性意見的雜誌乃告產生，此即《旁觀雜誌》創立的背景。

肆、《旁觀雜誌》的創立及其內容

《旁觀雜誌》（*The Spectacle Miscellanea*）的名稱究竟怎麼來的？羅克典雖有良好的黨政關係，但仍避免政治色彩太濃厚，遂取「旁觀者清」之意為雜誌命名。當時他可能沒有想到旁觀也可解為「袖手旁觀」，對國府採旁觀者的態度，也許羅自己的看法另有「不宜袖手旁觀」的寓意在，但雜誌篇名也成為這個雜誌短命的原因之一。

一份雜誌除發行人外，還需有資金、撰稿群、讀者。在資金方面，由於過去的人脈，他向下列人士試探，是否能以公司之名刊登廣告做為雜誌社經費，答案令人滿意。這些人是唐榮鐵工廠總經理唐傳宗、大同鋼鐵機械公司董事長林挺生、天立馬達機械廠主林壽南、黃東茂公司主人黃在榮、維和製藥廠林春土、臺灣人壽保險公司董事長羅萬俤、南華化學工業公司總經理、臺北區合會儲蓄公司董事長陳逢源（注11）。事實上出錢最多的是唐傳宗（注12）。

如果檢視創刊號的廣告情形可以對上述做一映證，如臺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工礦股份有限公司（全頁）、臺灣省合作金庫（3/4頁，總經理劉明朝、理事長謝東閔）、臺灣省石炭調整委員會（半頁）、臺灣第一商業銀行（全頁），可知不只是上述企業家經營者，還有劉明朝、劉明、黃朝琴等人協助。

在撰稿群方面，羅克典拜訪了數十位學者專家請求寫稿，卻不太順利，主要原因是對寫稿可能會引來麻煩而心生畏懼；也有的以中文寫作能力不足推託，使得創刊號一延再延，一直到1951年1月15日才創刊，又定為半月刊，到第9、10期才改為月刊。由創刊號來看，編者在〈編後〉介紹的撰稿者有知名省籍工業人材和政治人物，即王超英、林迺信、許金傳、許子秋、陳啓川，其他兩位一是張春山，據言是一個「老練的作家」，另一為林春山，對國際問題素有研究者，可見羅克典採訪的省籍人士之一斑。值得注意的是，他還注意到傳統詩人，如臺中詩人李榮煌（字櫻航）、袁試武、吳新榮等，特設專欄，容納其詩作（注13）。

至於社址，則選在唐榮鐵工廠館前路的辦事處。雜誌每一期約30多頁（月刊後，一期約50頁），每期大致的分類為「發刊詞」（創刊號），以後則是「卷頭語」；「國際問題」、「專論」、「科學珍聞」、「世界人物」、「本省人物」（合為人物誌）、「文藝」則包括「台灣詩壇」、「電影介紹」、「隨筆」、「編後」。雜誌的命脈是「卷頭語」、「國際問題」和「專論」、「人物誌」，為了成為一老少咸宜的綜合性雜誌，在第二期加上「幽默集錦」，刊登一些現在看起來已不怎麼好笑的笑話。第三期取消所有分類，但這期開始有雞籠生（陳炳煌）的扉畫，叫「旁觀者清」，一直到第五期（第四期為「辛勞者的期待」、第五期「團結」），而自第三期起開始連載下村海南的《終戰記》（由林寶誕譯），但到第15期（民國40年11月5日）即因林寶誕無法譯而缺，到第16期即由雜誌社找人譯，移「本刊特譯」，到18期（民國41年2月5日）結束，只連載了14次，終究沒有譯完。

第4期起又出現了專題，但只有「生理與科學」、「人物誌」，第5期增加二個專題「文藝」、「報導與介紹」，第6期取消「文藝」，將之分為臺灣詩壇、詞、新詩，增加了「父母子女文庫」。此期開始卷頭語有標題（除了第7期外），如第6期〈談民族道德〉，第8期〈談社會節約〉，第9、10期合刊〈增產與一元化生產政策〉，第11期〈談不合理現象〉，第12期〈正告英國及其聯邦〉，第13期〈我們的教育太成問題了〉，第14期〈珍惜民主的成果〉，第15期〈擇人的標準——貢獻給市縣議員諸公〉，第16期〈告日本工商界〉，第17期，〈一



年的檢討》，第 18 期〈人心的動員〉。由這些標題及內容看來，針貶時局的居多，歌頌當局的成分很少。

第 7 期開始了張深切連載其〈霧社櫻花遍地紅〉電影的劇本，一直連載到第 11 期。連載劇本、小說成爲此後雜誌的項目。自第 12 期有傅紫真的〈急流〉，一直到 15 期，這是傅紫真以唐榮（唐榮鐵工廠董事長、唐傳宗父）由大陸來臺發迹的經過爲題材而寫的小說；而自是期起也開始連載「卻泰來夫人的愛人」（艷情小說，由江山村譯）到休刊時才連載第四次。

第 8 期起標題又改爲「科學智識」、「娛樂天地」，「人物志」和「文藝」則未變。第 9、10 期刊於 1951 年 6 月 1 日，此後一直到休刊都是月刊，將第 8 期的「科學智識」改爲「醫學與科學」，取消「娛樂天地」。第 11 期開始有特稿的形式，如林起生寫的〈如何輔導本省萎縮的工業〉，第 12 期〈選舉戰觀戰記〉，第 14 期〈省臨時議會議長預測〉，第 15 期〈各縣市省議員競選預測〉，第 16 期〈中日貿易的變遷〉，第 17 期〈省臨時議會新像圖〉，第 18 期〈一屆省臨時議會觀戰別記〉。本刊之所以必須停刊，問題可能出在這些特稿，側寫、特寫省臨時議會諸公所導致。

第 12 期在「文藝」之外，出現了「臺灣文獻」標題，似乎本刊開始重視臺灣文化的傳承，這期介紹蔣渭水、廖溫仁，和「人物誌」介紹當代人物周百鍊、張祥傳有所區隔。第 13 期則介紹連雅堂，第 14 期取消了「臺灣文獻」，改爲「臺灣之昔日、今日風雲人物」，包括 4 篇文章，除前所提省臨時議會議長預測外，另 3 篇文章是〈日治時期臺灣民族運動紀要〉、〈乙未臺灣八日記〉、〈日治時代臺胞創辦之唯一報社〉，似乎相當重視臺灣歷史。到第 15 期，則改爲「臺灣風土」，刊登 4 篇文章〈臺灣山歌的形態〉、〈臺灣的諺語〉、〈臺灣先史新考〉、〈臺灣布袋戲〉。

第 16 期雖取消上述「臺灣」相關標題，卻刊登有兩篇重量級作者的著作，即王詩琅（錦江）〈半世紀來臺灣文學運動〉、楊雲萍（友濂）〈藍鹿洲的臺灣統治論〉。第 17 期有呂訴上〈歌仔戲、布袋戲與臺語話劇的活動情形〉、〈日據時代臺灣無名英雄簡述〉（郁南），還有宋文薰譯的〈東南亞最大的石斧〉。到 18 期有關臺灣相關研究即消失，這部分有賴《臺灣風物》雜誌接續。第 16 期還增加新標目爲「各地風光」，介紹土耳其、南極；第 17 期則增加「心理漫談」；第 15 期起有「醫叢」標目，第 18 期延續之。

這個雜誌的讀者群在那裏？以有限的資料無法知道，但由各期的〈編後〉可略窺一斑。第 2 期編後指稱，自創刊號出版以後，讀者尤其是文化界友人紛紛來函，給予建議（注 14）；甚至有由小鄉村來函，讓雜誌社了解農村讀者的要求（注 15）。而張深切的〈霧社櫻花遍地紅〉自第 7 期連載後，即「接到山地同胞的要求從速刊完全劇」，因此該社乃決定「全劇刊出後發行專冊，同時譯成日文，以饗山地同胞。」（注 16）該社在創刊進入第 8 期後，爲了和讀者交換意見，乃決定由發行部、編輯委員會負責人前往各地和讀者、作者交換意見，結果讀者的反應

是：要求增加編（篇）幅，並希望插入趣味性之作品（注17）。爲了回應，乃決定增加篇幅同時改爲月刊以爲回應（注18）。

由上述情況看來，本刊似乎有些讀者群。其售價是單行本一本3元，半年爲18元，一年32元。（成爲月刊後的售價爲15元，28元，）。

伍、《旁觀雜誌》的特色

本刊雖然僅發行18期（1951年6月1日發行的爲9、10期合刊本，之前爲半月刊，之後爲月刊），實際上是17期，自1951年1月到1952年2月，是一份短命的雜誌，但仍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

（一）本刊是一本以本省人爲讀者的雜誌，雖不如《自由中國》影響力大，但在當時也是對時局痛下針砭的刊物；而且特別重視臺灣人物、風土、文獻，下開《臺灣風物》發行的契機。舉例來說，如張星賢撰的〈臺灣體育界之期待〉一文（注19），他指出體育界的缺點，除了缺乏體育精神、沒有完備的運動場、沒有積極鼓勵的計劃外，還指出體育會缺乏固定基金，不能充份發揮力量，以致空口說白話，而且「指導者的言行不能一致，所以不能取得一般青年的信仰」應加改正。

第二個例子要舉江山村撰的〈由勞倫斯談起〉一文，旨在談1950年日本出版界出版了《卻泰來夫人的愛人》一書，不論是譯者、出版者，在書店呈列者，都被以「頒布猥褻文書」的罪名而提起公訴，其次提到日本人在二戰時期的思想取締，然後批評中華民國政府將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也列爲禁書，直覺「莫明其妙，而徒嘆爲什麼早不作農而偏要讀書，請政府闡明言論思想的取締方針，可以使我們適從。」同時也分析戰後臺灣文化人不開口說話的原因是「過去被日人罵爲『非日本人』，光復後被少數同胞罵爲『奴化思想太重』，認爲上述是『命運天注定』，但若因太守法不敢在人前發出心聲，就是奴性，則無話可說，但若臺灣文化人了解政府的取締方針，而想說真話的，當不乏其人」（注20）。指出政府的政策不明，是臺灣文化人噤若寒蟬的原因。

第三個例子再看楊基振〈論提高行政效率〉一文，他指出臺灣當前的缺點是「機關多、人多、牽制多、辦事缺乏科學性，另外是各機關的本位主義——這是說，只顧自己的事，未顧整個大體」，如省府審核一部進口日本片子，要經省府4個月審查，中央審查6個月，再費10個月上映許可才下來；又如商人8月下單購買日本冬帽，隔年帽子才運到，這是外匯頭寸不足導致；買土地一年多還不能完成登記；法院押人，經半年多尚未判決。然後他提出日治時期的臺灣，和他所服務過的滿鐵是多麼有效率，由於「罵」得頭頭是道，要避免政府找麻煩，在附則寫了如下附記：「此文爲筆者貢獻在政同志之一點意見：（一）文中之援例，完全爲提高行政效率之一命題做爲具體說明上之材料而所引用，並無意加以攻擊之意思；（二）現況與日管時



代的各種比較，唯以日管時代做比較之一標準而已，並不是日管時代之一切就是最完善的意思。以上兩點請各界諒之並願諸同志有以指正也。」（注21）

（二）本刊的撰稿者絕大部分是臺灣文化人自不待言，其中有如楊雲萍、蔡章麟、洪炎秋等大學教授，也有在工業界的菁英，如王超英、許金傳、林迺信；也有任職公家機構的，如楊基振、張星賢、楊杏庭、林衡道，還有日治時期臺灣重要的作家如王詩琅、吳新榮、郭水潭（千尺），藝術家如楊三郎、呂訴上，還有張風謨律師，許子秋、李騰嶽醫師，可說是當時高級的臺灣文化人。其中值得注目的是一些有中國大陸經驗的，如林迺信、楊基振、張星賢、郭海鳴（以上有滿洲國經驗）、張深切、洪炎秋（有北京經驗）、柯台山、盧志中（本名盧鼎鼎）（有武漢、重慶經驗），這些人常年在中國，中文的表達能力較強，寫文章也較知「分寸」，因此由他們來撰稿較為合宜。

（三）本刊重視臺灣人物的介紹，以介紹當代人為主，往後也介紹歷史人物，當然出資登廣告的老板也是介紹的對象。第1期人物志以〈唐榮和他的鐵工廠〉，第12期到第15期刊的〈急流〉亦以唐榮為主角所寫的寫實小說，即可見唐榮當時確是臺灣首屈一指的鋼鐵廠，而唐傳宗為本刊出資最多，因此對其老父和企業多做美言。第2期為教育家陳有諒，第3期為雙料博士郭松根，第4期為煤礦業界巨頭顏欽賢，第5期為印刷工會會長顏良昌，第6期為「模範地主陳啓川」，第7期為「標準銀行家簡萬銓」，第8期為剛任職高雄縣、彰化縣縣長的洪榮華和陳錫卿，第9、10期為「青年理事長黃添樑」，第11期為郭雨新、黃啓顯、謝掙強，第12期周百鍊、張祥傳，第13期馬有岳，紅茶之王郭少三，第14期羅萬俸，第15期地質專家林迺信，第16期以後即不再特寫，不過因第17期開始對臨時省議會的議員諸公報導，亦是另一種形式的臺灣人物介紹。上述這些人，有些並未被收入章子惠的《台灣時人誌》（一）（注22），因此具有參考價值。

（四）文藝中的新、舊詩是外省作者的重要園地，在「編後」都常有舊詩投稿踴躍，刊登不及的致歉信。其中較重要的外省人士首推曾今可，他1945年冬天來就講於臺灣省行政幹部訓練團，1946年因蔣中正60華誕，向全臺徵祝壽詩，有數千首應募，雖評有等第，然尚未刊行。1948年出版《建國月刊》，其副刊為〈台灣詩壇〉，在端陽節邀請全臺詩人集會，而後刊行《祝壽集》。1950年左右正是本外省人詩興大發的時期，本外省人聚會，一者以文會友，二者藉詩聯誼，是消弭裂痕最好的場合（注23），《旁觀雜誌》此時提倡舊詩，除使本外省人進一步接觸外，提倡新詩、散文，也對當時的文藝活動提供定期的舞臺。

陸、未向讀者說再見即停刊

《旁觀雜誌》如羅克典所說的，以本省籍作家文章為主，對時政不做無條件歌功頌德，在卷頭語上常不時作善意的批評與建議，若非發行人羅克典黨政關係尚稱良好，本刊不可能

維持1年2個月。先是黨高於國的國民黨主事者見不得批評，認為人民要無條件服從政府，本刊有反動的嫌疑，幸而有立法院長張道藩和中國青年救國團副主任胡一貫極力證明羅克典忠黨愛國，才沒事。

導致《旁觀雜誌》走向停刊命運的是得罪了融資給唐榮鋼鐵廠的華南銀行董事長劉啓光。惹惱劉的原因，是《旁觀雜誌》自第14期、15期報導所採訪、預測省議會議長、議員誰能當選，又在17、18期刊載〈省臨時議會新像圖〉、〈一屆省臨時省議會觀戰別記〉，對劉雖讚譽有加，不免有所批評，且劉本欲競選臨時省議會議長、副議長，也全鎩羽而歸，不免惱羞成怒。認為羅克典是外省人，1947年才來臺，不可能知悉臺人的底細；而唐傳宗既提供資金出版，復提供辦公室，遂被認定唐在背後唆使，甚至威脅唐，要取銷銀行貸款，又要告羅克典誣謗名譽。唐傳宗惶恐之極，乃向羅建議暫時停刊以避鋒頭，羅再三思考乃決定永久停刊，並把兩位本刊的得力助手安插到唐榮鋼鐵廠工作，羅也成為唐榮廠顧問而劃下休止符（注24）。

至於《旁觀雜誌》的報導，如何得罪劉啓光，以下引報導文之片斷，以見一斑。在陳添水具名的〈省臨時議會新像圖〉中，雖說了劉啓光相當正面的話，如說其在農組上的貢獻，又創設臺灣文化獎學基金以收買臺灣之文化人，又譽為「像這樣一個聰明英俊的人才，在省胞中確是不可多得。」之後話鋒一轉，稱「然而一個聰明的人，不一定包涵力大，往往可被包涵力所拖累。劉啓光因為看事敏銳，所以對於得失便多計算，因為城府深沈，使人交而莫測其高妙，因為自視頗高，所以把對手方常作過低的估計，尤其對於非吾族類，常會因不能容忍而給以無情的攻訐或打擊。因此由這包涵力遂造成了不少政敵，反對他的人就把他描繪成一位可畏的人物。這實在是劉啓光作為一個領導者最大的阻力。」

同時又說他相信一位叫葉半仙（即葉幽谷）的話，又說他若能在這次選舉中擁林頂立為議長，兩人合作，林必可中選，而劉也可當上副議長（注25）。這些話自然令劉極為不快。

柒、結語

一本刊行1年2個月即告終的雜誌，過去從未被重視過，因為他既非反對派雜誌，也不如比他早創立的《自由中國》對往後臺灣民主化起的作用大；既大量報導臺灣人物、風物，但不如今仍在刊行的《臺灣風物》來得純粹；但是這份雜誌仍具有以下幾個意義，第一、這是一個對臺灣人抱有同情心的外省人當發行人，提供臺灣人讀者、作者的雜誌，多少有益於化解本、外省人間的隔閡，也多少使臺人有宣洩的管道，有利於國民黨的統治；第二、撰稿者不少是有中國經驗、非重慶經驗的臺人，他們中文好，敏銳度夠，因此能行文針砭時局，使我們了解當時臺人的看法，並得到這些「準半山」的某些資訊，有利於往後的研究工作；第三、開發文藝欄，讓熱中於舊詩者有了園地，也藉此與外省詩人交流，亦有助於雙方間的和諧；第四、本年年底即將出版楊基振的日記與相關著作，但編著者並未將楊基振在《旁觀雜誌》所寫的新



詩和相關論著包括進去，後經筆者的建議方才放入，這些資料有助於補足楊基振在五〇年代對政府施政針砭及建議的相關論著，對了解戰後的楊基振特別重要。

此外，本刊的發行人羅克典在 1987 年完成其回憶錄：《憶往：八十一年雪泥鴻爪》，其中第廿四節〈創辦旁觀雜誌〉，對於他何以創辦雜誌，又何以雜誌僅維持 1 年 2 個月有概略的介紹可以參考，對了解《旁觀雜誌》頗有助益。

注釋

1. 1992 年政大新聞所碩士論文。
2. 刊登於《台灣史料研究》，第 7 期，1997 年 12 月，頁 3 - 24。此雜誌為財團法人吳三連史料基金會發行。
3. 所謂蓬萊島系列係指以黃天福為主要發行人，自 1980 年 9 月 1 日起發行至 1987 年 8 月 10 日止，以月刊、週刊的形式發行，包括《鐘鼓鑼》、《蓬萊島》、《西北雨》、《東北風》與《蓬萊人》，前後共 63 期，停刊 2 次。
4. 1995 年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5. 薛化元，《《自由中國》與民主憲政》（臺北：稻香出版社，1996）；林淇瀟，〈意識型態·媒介與權力：《自由中國》與五〇年代臺灣政治變遷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系博士論文，2004 年。
6. 許雪姬訪問、林世青紀錄，〈劉世達先生訪問紀錄〉，收入《民營唐榮公司相關人物訪問紀錄》（臺北：中研院近史所，民國 82 年），頁 193 - 194。
7. 據《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名錄》，其學歷是「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院」。
8. 1947 年 11 月由國民政府進行選舉國民大會代表，當時廣東豐順縣有吳逸志（長沙三次大戰協助薛岳司令官的一位名將）、鄧紹玄（豐順第五區專員）和羅克典三人出馬競選，選舉結果吳逸志當選，羅克典為第一候補，依當時可以遞補的惡法，羅克典乃成為國大代表。見羅克典，《憶往：八十一年雪泥鴻爪》（臺北：出版者不詳，民國 76 年），頁 119 - 120。
9. 創立於 1947 年，前身為臺灣省貿易商會，1950 年改組為物資局，屬省屬機構，此外還負部分管制貿易的責任。1950 年省府另於建設廳成立貿易科，專司貿易行政，而由物調會專司貿易經營，且重省內商業經營及對消費者所負的任務。許雪姬總策劃，《台灣歷史辭典》（臺北：行政院文建會、中研院近史所、遠流出版公司，2005 年 1 月，三版），頁 1115，董安祺撰。
10. 羅克典，《憶往：八十一年雪泥鴻爪》，頁 129 - 133。
11. 羅克典，《憶往：八十一年雪泥鴻爪》，頁 133。
12. 羅克典，《憶往：八十一年雪泥鴻爪》，頁 140。

13. 《旁觀雜誌》，創刊號，1951年1月15日，頁31-32。
14. 〈編後〉，《旁觀雜誌》，第2期，1951年2月1日，頁45。
15. 〈編後〉，《旁觀雜誌》，第5期，1951年3月16日，頁45。
16. 〈編後〉，《旁觀雜誌》，第8期，1951年5月1日，頁50。
17. 〈編後〉，《旁觀雜誌》，第9、10期，1951年6月1日，頁76。
18. 〈編後〉，《旁觀雜誌》，第11期，1951年7月1日，頁85。
19. 張星賢，〈臺灣體育界之期待〉，《旁觀雜誌》，第4期，1951年3月16日，頁20-21。
20. 江山林，〈由勞倫斯談起〉，《旁觀雜誌》，第5期，1951年4月1日，頁50。
21. 楊基振，〈論提高行政效率〉，《旁觀雜誌》，第13期，1951年9月，頁13-36；第14期，1951年10月，頁35-42；第15期，1951年11月，頁39-43。
22. 章子惠，《台灣時人誌》第一集（臺北：國光出版社，民國36年），本書共227頁，上述人物中陳啓川、郭雨新等人有傳，但如柯台山、盧志中、郭松根、張星賢、郭海時等則無傳。
23. 曾今可，〈編者序〉，收於林熊祥校、曾今可編，《台灣詩選》（臺北：中國詩壇，民國42年），頁12。
24. 羅克典，《憶往：八十一年雪泥鴻爪》，頁140-141。
25. 陳添水，〈省臨時議會新像圖〉，《旁觀雜誌》，第17期，1952年1月，頁10-11。

